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文艺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大意义,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在新的起点上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艺队伍是一支重要而关键的力量,因为文化史的发展表明文艺始终是文化建设的中坚。充分发挥文艺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是时代和人民赋予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

1.充分发挥文艺“增魅力”的功能,做到“因文明道”,更加积极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所在。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作家艺术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应该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进步的作家艺术家,都把高超艺术造诣和高尚价值追求作为人生态理想,大凡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都以美的力量和形式揭示和传播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观念。”文艺以其特有的意象化审美方式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方面有着特有的优势,自觉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文艺表现之中,塑造出体现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艺术形象,既可使文艺创造有主心骨的支撑,也使核心价值体系增添艺术魅力,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主张“原道心以敷章”,他说:“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一方面文能绘道、明道,鼓振天下;另一方面,道是文的内质和动力,道对于文发挥着根本性的支撑作用。恩格斯在称赞德国优秀画家许布纳尔一幅画的宣传作用时断言:“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

589页。这幅画描绘的是一群向厂主交纳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画面异常生动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贫困作了鲜明对比)在当今日益发达的新媒体传播时代,一部文艺作品的影响力或宣传作用可想而知。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更加关注和重视文艺作品“载道”、“明道”的功能,既要增强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要懂得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支撑意义,以使我们的文艺能够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好、更积极的作用。

2.充分发挥文艺“育主体”的功能,做到“以文化人”,更加自觉地践行塑造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时代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在人(不仅指文化人才),文化强国的根本标志在于核心价值体系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其基础在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程度——核心在于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自觉程度。文化强国的基石在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因为他人者观察、评价乃至是否愿意接受一国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于其文化产品的魅力,更在于其日常生活中的人民的魅力。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文艺是提高人民精神境界、培育人民高尚灵魂的重要力量。”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倡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通过以“文化人”,塑造和培育具有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精神境界和文明程度的新人,这些新人是建设和体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体。

“以文化人”既要体现“化”的效果,也要体现“文”的独特方式,体现着“文”的方式的“化”,其效果才更自然更恒久更突出。梁启超在《论小

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谈到小说影响人或“化人”的四种“神力”——“熏”、“浸”、“刺”、“提”。“熏”是“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的默化,“浸”是“人而与之俱化”的内化,“刺”是“使感受者骤觉”的点化,“提”是“自内而脱之使出”的自化。凡此种种,都是体现着“文”之特性的“以文化人”。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足见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艺术对于培育主体、培育新人的巨大意义和作用。无疑,社会主义文艺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体建设方面负有重要责任。

3.充分发挥文艺“新文化”的功能,做到“人文日新”,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动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的创造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培育和发挥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旺盛的文化创造力,善于在继承前人文化创造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文化创造,而且要勇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就是文化的原创性及文化的影响力,文化的原创性需要创新,文化的影响力同样需要创新,因为只有创新的文化才能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的精神需求,并通过这种满足来实现文化产品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文艺“新文化”的基本途径是推陈出新、综合创新,文化创新最不能是另起炉灶的创新,而是要在古今中外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的创新。文化创新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一是文化遗产的基础。文艺“新文化”功能的发挥必须立足于这两个基础。

4.充分发挥文艺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功

能要遵循两个规律,一是文艺规律,一是文艺发展规律。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文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深入研究事关文艺工作的重大问题,不断提高领导文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是充分发挥文艺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功能的根本保障。那么,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呢?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发展文艺事业”,“积极探索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组织形式、活动方式”。要求符合两个规律体现了对推动文艺科学发展,提高

文艺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视和强调。文艺有其自身规律,有其特殊的个性化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符合文艺规律就是要充分尊重文艺家的创造性,就是要充分理解文艺家创作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就是要

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4页)切实保护好文艺家创造探索的积极性。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党对于文艺发展规律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许多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原则和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发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加强文艺理论和批评,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其基本规律。在对待传统文艺和外来文艺方面,始终坚持批判和吸收相结合,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结合,坚持开放性和自主性相结合,使“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一重要规律。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必须遵循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方针和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新趋势要求注重其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的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不能以经济效益损害社会效益,更不能以商品属性排斥意识形态属性,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两种属性”和“两个效益”的关系。这是新的实践探索得出的新的文艺发展规律。不断地探索规律、发现规律、遵循规律,按照规律去引导和管理是全面发挥文艺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的必要条件。

## 学习讲话精神 繁荣文艺创作 笔谈(3)

# 创作自信的坚实依托是感应民心

□宋生贵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历史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要引导文化工作者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职责,坚持正确文化立场,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化产品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学术探索和艺术创作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我们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文艺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不再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明确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方向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二为”的提出,被人们称之为文艺领域历史转折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个春秋的今天,《决定》再次强调文艺事业“必须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认为,这除了体现出指导思想的一贯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特别是对于激励当下提升文艺创作自信力,创造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有着强劲的推动作用。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够真正创造出适于“二为”,且达到三个“无愧于”的优秀作品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可能有许多许多的不同认识与解答。我认为,从文艺创作者方面看,当下尤为关键的问题是,创作者一方面要接通“地气”,同时则又要提升境界。为此,则很自然地关系到文艺家的定位选择。

凡自觉的文艺创作,都在选择中进行,显见者如选择表现对象,表达方式,选择判断视角与尺度,以及价值取向等等。作为创作者个体是如此,而作为一个时代的创作,也是如此。

选择是一种自由,但同时也是一种限定。文艺创作的选择亦然。对于有责任感的创作者而言,构成其“限定”的突出方面,是社会与民众,以及与之深层相系的文化机制。无论人们把文艺看得多么一般或多么特别,多么浅俗或多么高雅,多么自成格局或多么开怀兼容,在这一点上却是绝少例外的。从图腾时代到现代文明,人类历经艰辛。在这伟大的历程中,虽然很难确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仰赖于文艺,但人们却早已认同这样一个事实:文艺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为相适于人类文明的

需要而存在,而发展变化。需要往往就是限定文艺创作及其审美趋向选择的直接原因,所以,所有文艺几乎都是一定人类精神的特殊“现身”情态,是一定时代之声的生动传达。

我们不妨就距今不远的“新时期”文学作一简要回顾,或可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中国的新时期文学,曾出现过群星璀璨的景象。当时,许多作家将文学紧紧贴在心间,去接纳与传达历史的创痛、民众的情绪、时代的苦乐——文学为实践个人良知所发现的真理而存在,文学成为人格理想与生命价值的体现。这样的创作一出现,就紧紧抓住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心,产生强烈共鸣。如《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故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都从较为广阔而复杂的向度,去表现特定社会境遇中民众体察至切的甘苦与忧乐。作品显示出强烈的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历史责任感。这一时期,作家及其作品在理解和感染世人的同时,得到了世人的广泛接受与理解。

可是,后来却有不少作家的选择在匆促中出现转向。其中创作上表现突出的一种态势,是在迅速所谓的“观念更新”、“文体自觉”的同时,作品却少了血泪,缺乏了情感力度,也忽略了现代精神和历史意识,因此,其震撼力与影响力明显减弱。至若某些灵感钝化、感觉泛滥而又“向内转”,或者明显以暴露性个人宣泄而淹没掉理性精神的所谓“创作”,更加缺乏与社会、民众进行审美交流的机缘。在一个时期,我们曾听到文学界慨叹声迭起,为文学的跌入“低谷”,或曰陷于“困顿”而表示深深的忧虑。应该承认,出现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在此“多方面”之中,重要的一点,或者说关节之所在,是作者忽视了作为根性所在的社会、民众这重要的因素。作者在急切“走向世界”的冲动下,或在“为下一世纪创作”的亢奋中,自觉不自觉地忘却了自己面前实实在在的接受群体的“期待视界”——一些作家热衷于新花样的快速更替,而群体鉴赏力的升值却被搁置一旁。因此,即使我们不怀疑其间确有真诚和激情,但也终不可无视那凌空蹈虚、躁气浮荡的事实。现在看来,其深层次的原因中,无疑含有缺乏文化自信的问题。

巴金先生曾讲:“把心交给读者”!这是一种自信的表达,也是走向自强的基础。当然,这自信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的,是脚踏实地大地的选择。这意味着,文艺创作者首先要立足于其生存的大地,保持与社会、民众心灵上的息息相通。同时,作为一种精神世界的向导,文艺还需要有喜悦的感觉!

那天在我家挖完了草莓,我对格瑞思说,最近看了一本美国2008年最佳短篇小说选,所谓的top 20,从当年全美100多本文学杂志里面挑选出来的精华,算得上是花中选花,可是第一篇我就看不下去。不知道是生词太多,还是故事太散?我不懂,这小说优秀在什么地方?这样的文章能入选,说不定是关系稿。因为格瑞思曾经对我说过,在美国期刊发表文章,也是要讲 Connection(关系人脉),有人推荐的稿件跟自己瞎撞的稿件,纵然质量相差不几,但是命运大不一样。格瑞思总说我递过来的小说,随便翻了两页,便坐了下来,定住了,两眼发光地读了下去,读后长长地感叹道:好小说啊,好久没有这样的享受了。那一刻,如醍醐灌顶,我忽然醒了,悟了:虽然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依然难以感受英文文学的美好,它的喜悦我无法体验!我在美国拿了学位又怎样?有职场的经验又怎样?是的,读报纸,听新闻,没有一点问题,对美国的影视,百老汇的歌舞剧,也有自己的眼光和见识。但是文学对我,依然是一

以强有力的精神力度奋然跃起,不断突破已有的模式(包括那些近乎完美的固有格局),不断攀上新的高度,扩大审美视界,大胆追求独到与新颖,经过坚韧的努力,以至促使接受群体鉴赏力的提升。这是一种贴近与超越同态相谐的审美趋向。这便要求文艺家首先能够沉下来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全身心地体察民生,倾听民声,并与民众进行心灵的沟通,以使其审美发现拥有与社会群体同步同态的基础。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能够实现超越,使其作品成为现代精神的向导,在审美发现上,有比接受群体超前的优势,导引群体迈向更高审美层次的进路。

文艺创作与社会群体的贴近,和在审美导向上的趋前,其间是有弹性和有层次的,可以留出开阖的天地,可供文艺家和接受者共同拼云播雨。道理很浅显,无论是文艺家还是欣赏者,都首先是社会存在的个体,而个体间往往是有差异的。如由于各人生活阅历、生存环境、文化素养等不同,便可能使不同欣赏者和创作者在艺术格调、审美情趣,以及理解和认识能力等诸多方面出现差别。因此,除去在文艺作品与欣赏者之间,正确理解文化适应的意义之外,更应通过文艺家与欣赏者的共同努力,在文艺活动过程中开拓多层次交流通道。在思想内容健康的前提下,使下自文化水平偏低,上至专家学者,所有民众都能获得适于自己欣赏的文艺作品。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应有的特殊使命。

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在文艺创作的文化指向与接受者之间,出现审美上的适应与错位同时存在,是不足为怪的。这点在当代文艺活动过程中会显得更为突出。对此,不能以某种“超前”的美学理论一概判定,也不应该用固有的审美模式去简单化地加范划一。而是需要充分拓展文艺家与接受者之间自由感应的空间——自由可以把握选择的契机和创造的空间(欣赏也是一种创造);感应可以在大的时代精神和新的美学追求面前呼应成趣,相互滋养。可贵的导向,可以使处于不同层次上的文艺家与接受者,都能去自觉地寻求审美鉴赏力的升值,而又都互不漠视,互不背离。在这方面,作家路遥与他的《平凡的世界》给人以一定启示,路遥将自己生命之根扎到了在情感上与他难以割舍的农村,以“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体察民众的甘苦得失,而因此写出的作品却迅速跨越山川,牵动了远非限于农民的多种文化层次读者的心。此可谓诚心可鉴,更可通!

应当承认,我们的文艺创作需要强健,我们的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对于文艺家来说,尤其需要沉下心来悉心体察,锤炼心志,同时还需要有魄力、有才情跃上宏阔的,甚至能以独特的审美发现穿透历史与现实的高度。这当然是有难度的。可正因难而方显可贵,对于高品质的文艺创作而言,尤其是这样。

条大河,浩瀚辽阔,从我眼前奔腾而过,可我就是无法看到彼岸的风景。格瑞思安慰我说:文学比不得影视,影视是件休闲的日常品,大多数人都用它来打发时光,因为看影视不用动脑筋,跟着画面和故事情节走就成。文学是件奢侈品,能读懂的人是少数,因为要用心和智慧去感受。你总是抱怨19世纪的英文小说很难读,满篇晦涩的句子,为什么难读?因为那个年代只有有钱人才能接受教育,读小说是件高雅的事,是上层人享受的奢侈品。

孟恒(美国)

## 儒家的生命传承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倒是拒绝了终极关怀之类的人生意义。但是曾子却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朱子解读说:“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尽管这一解说很牵强,但毕竟流传下来,可见这一观念对民间的影响。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孝”,尽管这一“孝”有很多难以说明的问题。可以看看《二十四孝图》上面的道德楷模故事,当中有我们用在道德标准无法解释的现象,所谓的教条在实践上本就存在问题,关键在于教条实施者如何决策。尽管我承认,道德说教仍然不是终极关怀,它仅仅触及人的表层。但是在清明祭扫之时,人站在墓地,如同身处阴阳之间,会思考和灵魂有关的东西,其实思绪只有在超越死生的方向上,才能领悟到生命的意义,诸如“贤愚千载谁知是,满眼蓬蒿

杨剑龙除了学术著作频频问世外,他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时不时见诸报刊。前几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汤汤金牛河》更是赢得文坛内外广泛的好评。今年刚结集出版的他的散文集《岁月与真情》,便让我们看到了学者在书斋外的风景与情怀。散文集列入作品80篇,分为感悟人生、江南烟雨、历史烟云、北国风光、南疆印象、海外掠影、人生真情、知青岁月、神性人性9个专辑。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人都有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读杨剑龙的《岁月与真情》就更多了一份亲切和共鸣。除“读万卷书”外,“行万里路”是许多读书人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书斋里的生活总有一种别样的风致和情韵。杨剑龙在游山览水之时,对富有人文底蕴的名胜古迹情有独钟。在描山摹水外,更着重于抒写蕴涵山水之中的文化情韵。正因如此他笔底的烟雨江南、历史风云、南疆北国,海外掠影,才多了一份厚重之气。

杨剑龙有过江西插队的知青经历,这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究竟是“磨砺”还是“磨难”,不同的人生态度自然会有不同的人生感悟。对杨剑龙来说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一种磨砺,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构筑了其平等的悲天悯人的底层情怀。我一直觉得有乡村和都市两种不同人生体验的人,人性或许会更健全和丰厚一些。散文集“知青岁月”篇中对乡村底层人物的关注,以及对这些底层百姓的良善和温情的情感表达,是那些把目光只专注于书斋里的学者很难具有的。

散文集中“人生真情”的那些篇什,也许更能触动人心深处的柔软。《一本毕业纪念册》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代学子的才华风采和人生理想,那种理想主义色彩的青春激情和那样纯真美好的友情,今天读来依然会荡起你心底的涟漪。《大学生活琐事锁忆》中的“男生宿舍里的时装秀”,不仅让我们见识了那个时代学子的特有幽默和风趣,更让我们见识了杨剑龙的性情和幽默笔致。《烙上心帆的一堂课》里,杨剑龙对对小班级里为救落水同伴而早早消隐的乡村少女哀婉落泪,那份情真意切特别让人动容。岁月和青春会消逝,但消逝不去的是人间的真情实意。诚如杨剑龙在后记里所说的,散文应该是真实的,写真事,抒真情,有真意,这是他写散文的追求。这份“真情”经过了岁月的长久沉淀,因此显得格外弥足珍贵。

《岁月与真情》里的有些早期篇什带着那一代人特有的痕迹,作者坦陈受到杨朔散文的影响,作者把这些早年之作坦然地放在集子里,这份“坦陈”和“坦诚”更让人看到了作者性情的真实一面。

共一丘”,“料得百年身作土,人间孤月映梨花”皆是此类。正如邓晓芒说的,哲学家是“冥河的摆渡者”,在冥河与尘世之间,才能思考到人生的意义。所以谈及儒家的生命传承,这里的“孝”倒确实有一种终极关怀的成分。季羡林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以前我对这段话不以为然,我觉得那些把自己看做历史承前启后的关键,其实不过仍是历史主义的庸俗观点。但是回想一下,如果仅把自己视作一个家族延續不绝的希望,那倒是能够将一份血液于水的亲情护持,并赋予它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是究竟要如何发挥,仍是任重道远。以前看到圣诞节被炒作得热热闹闹,现在又看到清明的肃穆庄严,我不禁想起了蒋庆的一个观点。他说,新教已经彻底世俗化,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了它的使命,应该不可能对人类社会超越现代性起到多少帮助,而天主教则过于“高雅”,与现代社会难以匹配,而佛教则能出人,进退有度,如果能够好好利用,也许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钟华波(广东)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zshelaxin@sina.com

# 书斋外的风景与情怀

□何雪英

## 书评

# 读者评论